

口头传说在非洲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

张忠祥

【提要】 随着传统史学向“新史学”发展,历史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理论和方法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口述史学方兴未艾。由于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文献资料的缺乏,口头传说对非洲历史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非洲国家独立后,在非洲本土历史学家的努力下,口头传说的价值得以重新发现。口头传说不仅是研究非洲历史的重要资料,而且提供了从内部解读非洲的钥匙。与欧美口述史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史领域所不同,非洲口述史研究重点遍及政治史、民族史和文化史等领域。非洲口述史不只是对文献档案历史的拾遗补缺,而是历史研究的主体,并且已经成为非洲史研究的亮点和特色。

【关键词】 口头传说 口述史 非洲史学

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传统史学向“新史学”发展,历史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层出不穷。在此背景下,口述史学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所谓口述史学,“又称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是以口述史料和口述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①由于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文献资料的缺乏,口述史料对非洲史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非洲的口述史料保存在丰富的口头传说之中。学术界,尤其是国内学术界对非洲口头传说和非洲口述史的研究还十分薄弱。^② 本文主要剖析非洲口头传说的特点,论述其在非洲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and 作用。

一、非洲史研究的资料问题

非洲史研究最常见的问题是资料短缺,尤其缺乏档案资料和其他书面文献,这种状况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更加明显。自20世纪中叶以来,历史研究手段的多样化,甚至是革命性的变化,给非洲史研究带来了新的机遇。时至今日,对非洲史研究有用的手段多种多样,简直是五花八门。托马斯·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非洲史学与史学家研究”(14ASS001)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上海市高校一流学科(B类)建设计划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规划项目”的资助。

① 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

② 国外对该问题研究的成果主要有:Joseph Miller ed., *The African Past Speaks: Essays on Oral Tradition and History*, Archon, 1980; Paul Irwin, *Liptako Speaks: History from Oral Tradition in Af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Claude-Hélène Perrot ed., *Sources orales de l'histoire de l'Afrique*, Éditions du CNRS, 1982; Karin Barber and P. F. de Moraes Farias eds., *Discourse and Its Disguises: The Interpretation of African Oral Texts*, Birmingham University Press, 1989; Leroy Vail and Landeg White, *Power and the Praise Poem: Southern African Voices in Histor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1991; David Cohen et al. eds., *African Words, African Voices: Critical Practices in Oral History*, Indian University Press, 2001。国内相关研究有,静水:《作为历史的口头传说》,《世界史研究动态》1986年第10期;高峰:《非洲口头传说的史实分析刍议》,《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李保平:《试论非洲口头传说中的史实与非史实》,《非洲历史研究》1997年第1期。

斯皮尔列举了 11 种与非洲历史研究相关的资料来源,包括考古资料,语言学资料,口头传说,生物学资料,艺术、艺术史和视觉文化、档案与文字资料、人种学和人类学资料、地理、气候和环境学、卫生、疾病、饥荒和人口统计学、历史绘画、海外非洲人的资料。^①又如,J. H. 格林伯格运用语言学的研究手段,对非洲大陆的语言进行了全面的分类和比较,从而解决了班图人起源地争论不休的公案。格林伯格计算出班图语中 42% 的词汇至今仍存在于西非各种语言中,由此推断,“班图人起源于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交界地区”。^②历史绘画包括岩画,可以从中找到文字资料缺乏记载的历史信息。有时,农作物的改变也会影响非洲历史发展的进程,如 16 世纪高产农作物玉米从新大陆引进到非洲,促使班图人口的激增,是导致班图人大迁徙的主要原因之一。当然,对非洲史研究而言,最常见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三类:考古资料、书面文献和口头传说。

非洲大陆历史悠久,历史遗址和文物都十分丰富。在 20 世纪,非洲考古取得重大进展,肯尼亚 1470 号人的发现和埃塞俄比亚人类老祖母“露西”的发现,证明了非洲是人类最早的起源地。考古资料弥补了非洲书面文献的不足。英国学者巴兹尔·戴维逊依据 20 世纪非洲考古学成就,从非洲人本身的活动出发,比较系统地还原了非洲的悠久历史和古老文明,写成《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一书,涉及非洲重大文明,如麦罗埃文明、古代西非文明、东非斯瓦希里文明、南部非洲的大津巴布韦文明等。该书“所讲的是在殖民统治时期开始以前,一千五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内,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和非洲人的情况”。^③

戴维·菲利普森的《非洲考古》比较全面地总结了 20 世纪 40 至 80 年代非洲考古取得的成就。^④安德鲁·里德和保罗·莱恩主编的《非洲历史考古》^⑤着重论述了与非洲历史学相关的考古成就,包括努比亚、斯瓦希里海岸、萨赫勒地区、尼日尔河流域、津巴布韦、大西洋奴隶贸易、南非的工业等领域的考古进展。此外,还有一些对非洲历史研究有帮助的考古文献,如安·斯塔勒主编的《非洲考古:批判性的介绍》、苏珊·凯希主编的《超越酋邦:通向非洲复杂性的途径》、约瑟夫·乌格尔主编的《前殖民时代非洲百科全书:考古、历史、语言、文化和环境》和马丁·豪尔的《非洲考古》。^⑥

就书面文献而言,非洲存在不平衡性。北非和东北非地区书面文献比较丰富,西非和东非地区次之,南部非洲和中部非洲最缺乏。古埃及发明了象形文字,后来又有了僧侣体、世俗体,这些文字为埃及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献。埃塞俄比亚历史上也曾留下丰富的文献资料,该国“编写皇家编年史的工作早在十三世纪就已开始。几乎每代君主,即便在衰落时期,至少有一部或一部以上详尽记录当时大事件的编年史。这个传统流传于整个十九世纪并延续到二十世纪”。^⑦

古代地中海沿岸的史学家和中世纪阿拉伯学者的著作中有相当部分涉及非洲的历史。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保存了部分古埃及的历史。例如,关于胡夫大金字塔,希罗多德认

① Thomas Spear, “Methods and Sources for African History Revisited”,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47 (2006), pp. 305 - 319.

② 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5 页。

③ Basil Davidson, *Old Africa Rediscovered*, Prentice Hall Press, 1960, pp. 1 - 2.

④ David W. Philipson, *African Archa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⑤ Andrew M. Reid, Paul J. Lane, eds., *African Historical Archaeologies*, Kluwer Academic/Plenum Publishers, 2003.

⑥ Ann Stahl ed., *African Archaeolog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Wiley-Blackwell, 2005; Susan Keech McIntosh, ed., *Beyond Chiefdoms: Pathways to Complexity in Af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Joseph Vogel ed., *Encyclopedia of Pre-colonial Africa: Archaeology, History, Languages, Cultures, and Environments*, AltaMira Press, 1997; Martin Hall, *Archaeology Africa*, BOYE 6, 1996.

⑦ I. 赫贝尔克:“十五世纪以来的文字资料”,J. 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一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办公室 1984 年版,第 87 页。

为10万人造了30年,光修筑石头通过的道路就用了10年时间,金字塔本身的建造用了20年。“金字塔是用磨光的石头,极其精确地砌筑成功的。每块石头的长度都超过三十尺。”^①成书于公元1世纪的《红海回航记》保存了东非阿克苏姆王国的早期历史。一些阿拉伯学者,如马苏第、白克里(1029—1094年)、伊德里西、亚库特、阿布-菲达(1273—1331年)、欧麦里(1301—1349年)、伊本·巴图塔(1304—1369年)和哈桑·伊本·穆罕默德-武扎恩等人的著作,记载了公元9世纪至15世纪左右的非洲历史,特别是西部和中部苏丹的历史。

17世纪西非重要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廷巴克图的史学家编写的《苏丹史》和《法塔史》,不仅记述了桑海帝国及其被摩洛哥人征服和统治的历史,而且还涉及这一地区的早期历史,包括古代加纳帝国和马里帝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非洲知名的历史著作有卡尔·克里斯琴·赖因多夫的《黄金海岸和阿散蒂史》和塞缪尔·约翰逊的《约鲁巴人史》。J. D. 费奇认为,“这确实是两部很严肃的历史著作。”^②比较著名的阿拉伯文献还有莫拉斯·法里亚斯主编的《马里共和国中世纪阿拉伯铭文:金石学、年代学和桑海-图阿雷格历史》以及塞纳·汉拉塔的《穆斯林历史,非洲社会:非洲伊斯兰研究前沿》(2005年)等。^③

非洲人也用自己的语言文字撰写历史。用斯瓦希里语撰写的《基尔瓦编年史》成书于1530年左右,现在能看到的是1877年在桑给巴尔复写的。也有用巴蒙文和瓦伊文写的历史资料。巴蒙文是土生土长的非洲文字,流行于喀麦隆中部,是一种象形文字与音节文字相结合的文字。20世纪初期,巴蒙王国的国王尼奥亚(1885—1931年在位)利用在巴蒙人中早已存在的象形文字符号,发明了一套特殊的字母符号。最初共有510个字母符号,经过4次改革后,到1918年定型时简化为92个字符。尼奥亚国王曾用巴蒙文编写了一部名为《巴蒙的历史和习俗》的著作,并主持编写了巴蒙传统的医学处方,整理了一些民间文学作品。瓦伊文是穆穆卢·杜韦拉·布克勒于1833年前后发明的,它流传于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境内的瓦伊族,是一种以记事符号为基础的音节文字。到了19世纪末,几乎所有的瓦伊族人都认识这种文字,用这种文字写私人信札和官方书信、记账,记载习惯法、谚语、故事等。邻近民族,如门德族、托马族(即洛马族)、格尔泽族(即克佩勒族)和巴萨族,采用和改革了瓦伊文,用于类似的目的。^④在尼日利亚南部伊格博人和相邻的喀麦隆埃克伊族居住地区,流行的是另一种图画文字——恩西比迪文。它于19世纪末才被外人知晓。当地居民主要用它记载秘密社团的活动,并在寺庙中使用。这套文字由无数个简化了的图画文字符号组成。

此外,西方文献、印度文献、波斯文献、中国文献都保留着大量非洲史的资料。1415年葡萄牙占领摩洛哥的休达城,标志着非洲开始进入被西方殖民的时代,在长达五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殖民主义与非洲结下不解之缘。来自西方的传教士、探险家、商人、殖民官员、旅行家和移民等都曾留下对非洲的记载。自16世纪以来,欧洲人对非洲的文献记载“浩如烟海,即使是最重要的著作或作者,也无法一一列举。”^⑤从书写非洲的欧洲作者的国籍来看,16世纪主要是葡萄牙人,17世纪多数是荷兰人、

①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66页。

② J. 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一卷,第20—28页。

③ P. F. de Moraes Farias, ed., *Arabic Medieval Inscriptions from the Republic of Mali: Epigraphy, Chronicles and Songhay-Tuareg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Sean Hanratta, “Muslim Histories, African Societies: the Venture of Islamic Studies in Africa”,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46(2005), pp. 479—491.

④ D. Dalby, “Survey of the Indigenous Scripts of Liberia and Sierra Leone”, *African Literature Studies*, Vol. 8(1967), pp. 1—51.

⑤ I. 赫尔贝克:“十五世纪以来的文字资料”,J. 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一卷,第92页。

法国人和英国人,18 世纪多数是英国人和法国人,19 世纪多数是英国人、德国人和法国人。关于非洲历史的西方文献可以参考费奇的《欧洲出版文献中关于西非前殖民时代的原始资料导读》、亚当·琼斯和比特里克斯·海因茨主编的《1900 年前撒哈拉以南非洲欧洲文献资源》等。^① 记载非洲历史文献的还有中文文献,如曾经四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费信撰写了《星槎胜览》,该书记载了东非城邦的商业贸易、居住环境、风土人情、气候物产等情况,成为研究东非国家历史和中非关系史的重要材料。

总的来看,非洲尽管有阿拉伯文、豪萨文、斯瓦希里文、阿姆哈拉文、瓦伊文、巴蒙文和富尔富尔德文等文字的书面资料,以及中文和西方文献资料,但是就历史研究而言,非洲书面文献明显不足。首先,分布不均,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是中南部非洲缺乏文字资料。其次,文字不够普及,“至今黑非洲绝大多数本地语言尚无相应的文字,在 1000 多种本地语言中,只有 50 多种有文字或正在形成文字,不及总数的 1/20”。^② 再次,记述非洲的西方文献尽管很丰富,但其不足也是十分明显的,西方文献涉及的时间是有限的,主要涉及非洲近现代历史,即便是非洲近现代史仅凭西方文献也是不全面的。最后,黑人创造的文字时间普遍比较短,黑人自己创造的语言文字,如瓦伊文、巴蒙文、富尔富尔德文等一般只有一两百年的历史。因此,非洲缺乏系统的、贯穿古今的编年史。

非洲的历史记录除了书面文献和考古资料两个来源之外,还有口头传说。口头传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最直接、最丰富和最真实的历史资料来源。正如一则非洲谚语所说:“老人的嘴气味难闻,但所说的却是金玉良言。”^③对非洲历史研究而言,口头传说非常宝贵。

二、非洲口头传说的特点

非洲传统社会里,语言不仅是日常的交流手段,而且也是传承先人智慧的一种载体。口头传说就是通过语言口口相传保存和传播非洲人民历代所创造和积累的精神生活的活宝库。口头传说首先是一种资料,它不仅是关于过去的资料,同时也是关于人们怎样不断解释它的叙述。口头传说还是一种内部信息,它的涉及面远比一般有文字社会所保留的书面资料广泛得多,如关于人生观、迁徙争斗、对外部世界的描述、本地人口或本集团各阶层的内部叙述等。加纳谚语说:“悠久的往事存留在人们的耳朵里。”^④口头传说从各个侧面反映了非洲人民的风俗文化和社会生活。鉴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多数民族迟至 19 世纪尚无自己的文字,口头传说对其早期历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正如研究口头传说的学者 J. 范西纳所指出的:“撒哈拉沙漠及其以南地区的非洲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口头文化,即使像西非这样从 16 世纪以来就存在文字的地区,也属于口头文化,因为只有很少数人会写字,而且文字对于一个社会所关注的大事常常是没有多大作用的。”^⑤

非洲的口头传说与世界上有些地方的口头传说相比不仅时间悠久,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今天;而

① J. D. Fage, *Guide to Original Sources for Pre-colonial Western Africa Published in European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4; Adam Jones and Beatrix Heintze eds., “European Sources for Sub-Saharan Africa before 1900”, *Special Issue of Paideuma*, Vol. 33 (1987).

② 李保平:《非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84 页。

③ J. 基-泽博:“总论”,J. 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一卷,第 5 页。

④ K. Daaku, “History in the Oral Tradition of the Akan”, see R. Dorson, ed., *Folklore and Traditional History*, 1973, p. 42.

⑤ 简·范西纳:《口头传说与方法论》,载 J. 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一卷,第 142 页。

且相较某些地方的口头传说要丰富,涉及神话、历史、祷词、民谣、故事以及谚语等。除此之外,还具有下列的特点。

首先,非洲口头传说有专门的传授者。与现代口述史研究者运用现代录音手段访问亲历者有所不同的是,非洲的口头传说靠专职讲述者代代相传。这种历史的讲述者往往是一些声音嘶哑、讲究礼仪、白发苍苍的老人,如同历史的活化石。在西非曼德人的传统社会里,人们崇拜那些专司讲述往事的长者,认为越是年长者,越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讲述者,讲述的真实性也就越强。^①

在西非的传统社会里,口头传说的传承者被称作格里奥(Griot),被看作非洲历史的活记忆,是非洲的最好证据。关于马里帝国开创者的史诗《松迪亚塔》,就是通过格里奥代代相传保存下来的。最后一名格里奥名字叫杰里·马莫杜·库雅泰,他的母亲是宾杜·库雅泰,他的父亲是说唱艺术大师杰里·克迪安·库雅泰。“从上古时代起,库雅泰家族就专门侍候芒丁国的凯塔王公:我们是存放语言的口袋,在这个口袋里藏着千年万载历史的秘密,我们觉得说唱艺术并不玄妙。如果没有我们,国王的名字就会被忘记,我们就是人类的记忆;我们用生动的语言,把国王的丰功伟绩传给后代。”^②在班巴拉语中,格里奥被称作多马或索马即“博学之士”,或被称作多尼凯巴即“知识制造者”。在富拉尼语中,他们依地区的不同而被称作锡拉蒂奎,甘多或特基奥里克内,意思均为“博学之士”。他们通常具有惊人的记忆天赋,也往往是传说所传下的过去事件或当代事件的案卷保管人。^③ 尽管在非洲传统社会里的名称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职责是类似的,就是通过博学和非凡的记忆能力,将各自民族的历史代代相传。因此,要写出一部完全属于非洲的历史,就必须依靠这些口头传说者不可或缺的叙述。

格里奥一直存在到现代。莫洛姆·加奥洛是塞内加尔著名的口传历史传承人,拥有塞内加尔全部富拉尼人的谱系学知识。他有参加各大家族的每次洗礼或葬礼的习惯,以记下生死情况,将其列入记忆中已汇编的名单。莫洛姆·加奥洛终年105岁,大约在1968年去世。他的儿子马马杜·加奥洛住在马里,继承父业。^④ 此外,为了培养口头传说的传承人,非洲的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专门的学校。例如,“在马里和几内亚,几个世纪以来,在凯拉、基塔、尼亚加索拉、尼亚尼等地一直有真正的启蒙学校”。^⑤

其次,非洲口头传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在非洲传统社会里,因为没有文字,各民族的历史只能通过口头传说来保存。如在津巴布韦的口头传说中,有大量的关于绍纳人的历史王朝——马塔帕王朝和制罗兹维王朝的资料。^⑥ 南非的口头传说中,人们可以听到无数关于祖鲁英雄恰卡、丁刚和丁吉斯瓦约的故事与歌谣。口头传说也有比较完整的谱系,如《松迪亚塔》开篇就说:“凯塔族的祖先毕拉里·布纳马是先知穆罕默德忠实仆人。毕拉里·布纳马共有七个儿子,大儿子拉瓦罗从圣城出发,定居在芒丁国;拉瓦罗生下的儿子取名叫拉塔尔·卡拉比,拉塔尔·卡拉比的儿子叫达马尔·卡拉比,达马尔的儿子名叫拉希拉杜·卡拉比……拉希拉杜·卡拉比有两个儿子,长子名叫卡拉

① Jan Vansina, *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 130.

② 吉·塔·尼亚奈:《松迪亚塔》,李震环、丁世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③ A. 哈姆帕特·巴:“逼真的传说”,J. 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一卷,第126—127页。

④ A. 哈姆帕特·巴:“逼真的传说”,J. 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一卷,第142—143页。

⑤ J. 基-泽博:“总论”,J. 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一卷,第8页。

⑥ 参见 T. O. Ranger, *Revolt in Southern Rhodesia, 1896 - 1897*, Heinemann, 1964; D. N. Beach, *The Shona and Zimbabwe, 900 - 1850*, Heinemann, 1980.

比·朋巴,次子叫卡拉比·多曼……卡拉比·朋巴的儿子名叫马马迪·卡尼……马马迪·卡尼生了四个儿子:卡尼·新朋、卡尼诺果·新朋、卡巴拉·新朋和新朋·巴马里·塔诺果克林……后来,巴马里·塔诺果克林的后裔继承了王位;他的儿子名叫巴里·奈奈,孙子叫贝洛,曾孙叫贝洛·巴孔;贝洛·巴孔的儿子叫马汗·孔·法塔。马汗·孔·法塔是伟大的松迪亚塔的父亲。”^①可见,《松迪亚塔》追溯了主人翁之上的14代祖先,展示了一段比较完整的谱系。

口头传说是非洲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有时也是唯一的可直接利用的史料。例如,刚果的姆博奇人,只有靠口头传说才能在时间和空间上重现他们各个酋邦的历史。口头传说还能解决文字记载无能为力的问题。编年史学家德拉波特于1753年和普罗亚特于1776年都记载说,在中非西部的洛安加王国,历代国王分葬于两处墓地,一处在卢布,另一处在勒万吉里。至于分葬的时间和原因,至今所知的文字记载都没有谈到。“只有今天维利人的口头传说解释了这个分葬现象。由于马卢安戈王朝和勒万吉里的人民之间发生了激烈争执,当时的国王和王公不得已决定改换墓地。就这样,由于王室同王国一个富饶省份发生了冲突,放弃了勒万吉里墓地,改葬在卢布的墓地。”^②在这件事情上,口头传说弥补了文字记载之不足。

最后,力求真实。在兰克学派影响下,通常只承认档案材料是历史研究唯一可靠资料的西方学者认为,非洲口头传说经过历代讲述者的口口相传,其真实性值得怀疑。默多克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说,非洲“当地的口头传说完全不可靠”。^③研究非洲口述史的简·范西纳也表现出比较慎重的态度,认为要使口头传说成为可靠资料,就必须进行批评性的把握。^④

事实上,非洲口头传说并非无稽之谈,因为据实叙述历史是格里奥的职责道德。如《松迪亚塔》的传授者所言:“我的语言是纯洁的,在里面找不到丝毫谎言杂质,这是我父亲的语言,也是我祖父的语言。我要把我从父亲那里听到的话原原本本告诉你们;国王的格里奥从不说谎。”^⑤英国非洲史学者巴兹尔·戴维逊认为非洲口头传说是真实可信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个名叫托尔戴的比利时人沿着刚果河大西洋出海口溯流而上,来到非洲密林的中心布雄哥人的地方,听当地长老讲述他们的口头传说。长老侃侃道来,从从容容地列举了120个国王的名字,一直追溯到了雄才大略缔造国家的神王。当讲到第98位国王包·卡马·包曼恰拉时,长老说,在他执政期间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某天中午时分,太阳没有了,顷刻间一片漆黑。过了好几个月,托尔戴清楚查到1680年3月30日发生过一次日全蚀,正好就在布雄哥上空。“托尔戴的成就揭示了,在有文献记载以前的许多世纪——‘原史’世纪——非洲已有历史是可能的。”^⑥

如实地讲述口头传说不仅是格里奥的基本道德,也是有行业禁忌及规范的。对于一个非洲传统社会的格里奥或者多马,无论知名与否,都必须比其他人更尊重事实。因为,对于他们,说谎不仅是道德上的污点,而且违背礼仪禁令,因而有碍完成自己的任务。所以,要成为一位受人崇敬的博学之士,成为一名真正的格里奥或者多马,首先就是如实地口述历史。这样的格里奥,人们会称赞他是一

① 吉·塔·尼亚奈:《松迪亚塔》,李震环、丁世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6页。

② T. 奥邦加:“非洲史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和专门技术概述”,J. 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一卷,第58页。

③ G. P. Murdock, *Africa: Its People and Their Culture History*, McGraw Hill, 1959, p. 43.

④ J. 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一卷,第44页。

⑤ 吉·塔·尼亚奈:《松迪亚塔》,李震环、丁世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⑥ 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屠尔康、葛佑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2—13页。

个“马阿”(即一个完人)。与此同时,经受传统熏陶的非洲人,“对一位传统主义者——多马的话,连做梦也不会怀疑其真实性,特别是在传授从祖辈继承下来的知识时更是如此”。^①

三、非洲口头传说的再发现

非洲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口头传说。但是,长期以来各种荒诞的说法和偏见使得外界无法了解非洲的真实历史。人们把非洲各时期的社会看成没有历史的社会。直到20世纪最初几十年里,还有许多学者未能摆脱若干先入之见,认为由于缺乏书面材料和文件,无法对非洲社会进行科学研究。牛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休·特雷沃尔-罗珀说:“可能在将来会有非洲历史可以讲授,但目前还没有,只有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其余是一团漆黑……而黑暗不是历史的题材。”^②19世纪以来的实证主义史学对档案资料十分看重。在欧洲传统史学家看来,口头传说只是神话和童谣,根本不是研究历史的基本材料。这种状况在非洲的一些国家独立后有了很大改变,人们重新认识到口头传说的价值,把它广泛运用到非洲历史研究中去。原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说:“口头传说,长期以来它一直被人轻视,现在却成了了解非洲历史极其有价值的工具,使人们有可能追溯非洲不同民族在空间和时间两方面的活动,从内部了解非洲对世界的看法,真正领会这个大陆文化和制度所根据的准则的独有特征。”^③

非洲口头传说的再发现,兼具内因和外因。从内因角度来看,重视非洲口头传说是非洲民族主义历史学派所追求的目标之一。非洲国家独立后,迫切需要建立民族史学,消除殖民史学的影响。而20世纪非洲最有影响的史学流派是民族主义学派,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学派和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学派。“从非洲观点观察非洲”,是伊巴丹学派的座右铭,也就是说要还非洲历史的本来面貌,改变殖民史家从外部看非洲历史的偏颇做法。伊巴丹学派的创始人尼日利亚历史学家肯尼思·翁伍卡·戴克在其代表作《1830—1885年尼日尔三角洲的贸易和政治》^④中就使用了大量的口述材料和文字记载。他的贡献在于承认口述传统为历史研究的合法史料。1965年,由戴克教授主持的“伊巴丹历史”系列丛书开始出版。在“导言”中,戴克教授批判了将文字档案等同于历史的欧洲史学传统,批判了将非洲史写成在非洲的欧洲人的历史这一殖民史学传统,明确地提出要继承古代及19世纪以来的非洲史学传统,将口头传说和多学科方法引入非洲史学。^⑤国际非洲学会于1961年召开的关于热带非洲史学家这一专题的达喀尔讨论会,以及1965年在达累斯萨拉姆召开的关于非洲史新观点的讨论会,均主张采取新的研究方法,并特别强调了口头传说作为非洲史资料来源的独特作用。

从外因来看,非洲口头传说重新受到重视,也有国际学术背景,即与现代口述史学的蓬勃发展有关。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的创建,标志着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1966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成立,创办《口述历史通讯》,后来更名为《口述历史评论》。口述史学的兴起,使之

① A. 哈姆帕特·巴:“逼真的传说”,J. 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一卷,第127—129页。

② Hugh Trevor-Roper, “The Rise of Christian Europe”, *The Listener*, Vol. 70 (1963), p. 871.

③ 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序言”,J. 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一卷,第xx页。

④ Kenneth Onwuka Dike, *The Trade and Politics in the Niger Delta 1830-1885: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Nigeria*, Clarendon Press, 1959.

⑤ 参见张忠祥:《20世纪非洲史学的复兴》,《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第4期。

在经济史、科学史、劳工史、社会史、妇女史、黑人史、亚文化群体、家庭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等领域分别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不仅成为一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和手段,而且成了一个新的历史学分支。20世纪70年代时任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主席的塞缪尔·普罗克特由此宣称:“口述历史的时代已经来临。”^①西方学者开始在非洲史研究中注重对口头传说资料的使用,如《剑桥非洲史》关于马里帝国13世纪20—30年代历史的叙述,主要也是取材于《松迪亚塔》提供的口述史料。^②在欧美现代口述史学兴起之后,作为口述史学主要载体的口头传说自然不会继续被人贬低和忽视,它的价值亦被重新发现。

20世纪60年代之后,非洲的一些国家加强了对口头传说的保护。在马里共和国的凯拉村,就有一些格里奥还保存着凯塔王室的口头传说。每过7年,凯拉村的迪亚巴特氏族都要举行一次重建“卡加巴的卡马布隆”(茅屋礼堂)的仪式。他们在这种节庆典礼上,总要回顾松迪亚塔的事迹和马里帝国起源的故事。基塔是口头传说的另一个传授中心。当地的格里奥家族的成员马萨·马坎·迪亚巴特已经把有关他那著名的叔父凯勒·蒙松业绩的传说收集和记述下来。在几内亚境内有两处口头传说传授中心,一处是尼扬当河畔的法达马,由孔戴族的格里奥主持;另一处是杰利巴科罗。在尼亚尼也可以收集到口头传说,而当地的凯塔村则正好坐落在几内亚古都的遗址上。在塞内冈比亚,由格里奥传授历史,除了传颂松迪亚塔的传奇故事外,还十分重视宣扬他手下名将蒂拉马汉·特拉奥雷的事迹。正是这位名将征服了这一地区,因而被认为是冈比亚河与里奥格兰德河之间的加布王国的缔造者。^③在塞内加尔有桑戈尔基金会卡布口头传说研究会,专门从事口头传说的收集和

四、口头传说与非洲史研究

非洲口述史的研究起步比较早,当伊巴丹学派将口头传说作为主要资料来研究非洲历史的时候,现代口述史学刚刚在美国兴起。非洲口述史与现代口述史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口述史是非洲史学的传统,口述史研究对非洲历史研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发扬与用好这一传统。而对于欧美学术界而言,口述史则属于新史学,甚至主要是一种社会生活史、劳动人民的历史或者是对正史的补遗。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教授保罗·汤普森认为,口述史促使历史研究从“自上而下”的精英史研究转向了“自下而上”的平民史研究,口述史用人民自己的语言把历史交还给了人民。其在展示过去的同时,也帮人民自己动手去建构自己的未来。^④在研究方法上,欧美现代口述史主要利用现代的录音设备,对事件的亲历者进行采访。美国学者多纳尔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就是通过录音访谈来收集口头回忆和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评论。”^⑤而对于非洲人来说,口述的历史不仅是过去的积淀,而且是“现在与将来之躯体的活生生的气息”。^⑥在非洲传统社会里,口述史是有生命气息的、活生生的,不仅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而且也是共同体的精神家园,如果把它记录下来,刻板化了,那它就失去

① Samuel Proctor, "Oral History Comes of Age", *The Oral History Review*, Vol. 3 (1975), pp. 1-4.

② J. D. Fage and R. Oliver,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Vol.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377-378.

③ D. T. 尼昂主编:《非洲通史》第四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105页,注释28。

④ 保罗·汤普森:《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覃方明、渠东、张旅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27页。

⑤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

⑥ Ayele Bekerie, "The Ancient African Past and the Field of African Studies",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Vol. 37 (2007), pp. 445-460.

了生命力。

口头传说不仅是研究非洲历史的重要资料,而且提供了从内部解读非洲的钥匙。非洲国家独立后,在本土历史学家的推动下,口头传说广泛地运用到非洲历史研究之中,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就,具体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非洲学者利用丰富的口头传说资源,弥补了档案和文字资料的不足,与国际学者一道,完成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8卷本《非洲通史》的撰写。《非洲通史》共有39名编委,其中2/3是非洲学者,而且分卷主编主要是非洲学者。例如,第一卷主编是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的基-泽博,第二卷主编是埃及的考古学家G. 莫赫塔尔,第三卷主编是摩洛哥的学者埃尔·法西,第四卷主编是塞内加尔的D. T. 尼昂,第五卷主编是肯尼亚的奥戈特,第六卷主编是尼日利亚的阿贾伊,第七卷主编是加纳的阿杜·博亨,第八卷主编是肯尼亚的马兹鲁伊。如果不收集和利用非洲丰富的口头传说资料,要想撰写一部非洲通史简直是不可能的。所以,《非洲通史》的编委和作者都十分清楚口头传说对重构非洲历史尤其是古代史的作用和意义。在编辑八卷本《非洲通史》的第一阶段,即从1965年到1969年的收集资料和制订工作计划的阶段,他们便着手收集口头传说,建立口头传说的区域文件中心。其重要性正如T. 奥邦加所言:“非洲的口头传说比起其他任何地方的,都更是史学家基本材料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大大扩大了材料来源的范围。写非洲史的时候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口头传说反映的时代呼声排斥在历史研究之外。”^①

《非洲通史》在论述撒哈拉以南非洲历史的时候,大量运用了口头传说。例如,在《非洲通史》第四卷的第6章至第10章中,非洲史学家在研究马里、桑海和加涅姆-博尔努诸国,以及位于尼日尔河湾内的莫西和达贡巴等王国的历史时,尽可能地运用了口述史资料。口头传说帮助历史学家复原了公元11世纪至13世纪的西非历史。通过对口头传说的研究,非洲学者了解到,在加纳衰落和马里崛起期间有一个索索族统治的时期。索索族是由索宁克-曼丁哥人分裂出来的集团,他们反叛伊斯兰教,一度统治了曾经由卡雅·马汉统治的地方。1325年,松迪亚塔·凯塔在著名的基里纳战役中打败了索索族国王苏曼古鲁,建立了新曼丁哥帝国(即马里帝国)。事实上,从1076年前后阿尔莫拉维德王朝占领昆比,到1235年松迪亚塔取得军事胜利和建立马里帝国,这段时期关于西苏丹的文字资料寥寥无几。非洲学者能够重构11世纪至13世纪的西苏丹历史,完全得益于当地丰富的口头传说。曼丁哥地区,包括康加巴附近的凯拉在内,有许多口头传说传授中心(或“学校”)。由迪亚巴特氏族的“格里奥”们主持的有:尼亚加索拉、杰利巴科罗、凯塔和法达马……这些“语言大师”们所传授的是马里历史那丰富多彩的变形,而且全都汇集于松迪亚塔个人的传说故事。^②

其次,利用口头传说研究地区国别史和民族史。在口头文化的社会里,历史存在于集体记忆之中,并被忠实地保存着。研究马里口头传说的专家A. 哈姆帕特·巴在纯口头传说基础上设法收集各种资料,写出了《十八世纪马西纳富拉尼帝国史》。作者属于当地统治者提德雅尼家族,从童年起便具有听取和记忆各种传说的理想条件。作者父亲的邸宅里总是宾朋满座,日夜都有大型集会。作者在幼年时就认识了讲富尔富尔德语的故事讲述人、谱系学家和史学家科莱尔,跟随他周游各地,知晓了许多故事和传说。成年后,作者开始系统地收集材料。首先全部记录各种传说;其次,

① T. 奥邦加:“非洲史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和专门技术概述”,J. 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一卷,第58—59页。

② D. T. 尼昂:“马里和第二次曼丁哥人的扩张”,D. T. 尼昂主编:《非洲通史》第四卷,第96—105页。

将马西纳克人的传说同图库勒人或其他有关种族人的传说加以比较,整个过程历时15年。收集材料意味着旅行,作者从富塔贾隆(塞内加尔)旅行至卡诺(尼日利亚),走过塞古·阿马杜和哈吉·奥马尔当年旅行过的全部路线,记录了至少一千人讲述的传说。^①1960年底,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教授J. 德维斯、D. 罗伯特和S. 罗伯特对加纳王国的城池泰格达乌斯特进行了挖掘。他们综合利用了当地的口头传说、中世纪的阿拉伯编年史和考古技术,复原了这一地区的古代历史,“就这样,非洲史上一段很少为人所知的时期(七世纪到十三世纪)又入了档案了”。^②肯尼亚独立后第一代史学家奥戈特在他的博士论文《南部卢奥族的历史》中几乎完全依靠了口头传说,撰写出一部肯尼亚卢奥族的历史。^③

最后,非洲口述史的新发展。非洲口述史除了重新建构整个大陆的历史,或是某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之外,也开始向研究某个特定区域的历史包括社会生活史、疾病问题等延伸。如简·本德·谢特勒在《口头记忆在口传中的断裂:西塞伦盖地群落区域环境的变化(1850—1895)》一文中,利用口头传说聚焦坦桑尼亚西塞伦盖地地区的历史研究。^④查尔斯·凡·奥塞伦在《我的种子:卡斯梅纳的生活,一个南非佃农,1894—1985》的传记中,近500页篇幅是根据对66位受访者、几十个受访者的家庭成员和白人雇主的采访而写成的。^⑤杰拉德·奥本海姆和罗纳德·贝耶的《破碎的梦?南非艾滋病口述史》则是利用口述史研究了疾病史问题。^⑥

结 语

总的来看,口头传说成了非洲得天独厚的史料资源。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口头传说有非洲这样丰富。非洲国家独立后,本土史学家重新发现口头传说的价值,把它广泛运用到非洲历史研究中去,从而推动了非洲口述史学的发展。非洲口头传说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是其他地方所无法比拟的,这由非洲历史研究的资料现状所决定。如果没有口头传说的支撑,非洲古代历史和一些非洲国家民族的历史将无法知晓。因此,口述史在非洲史研究中不仅仅是拾遗补缺,而是必不可少的主体。欧美口述史研究的重点是在社会史领域,例如农村史、城市史、妇女史、家庭史、企业史和个人传记等,而非洲口述史的研究重点是政治史、民族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等,已经成为非洲历史研究的亮点和特色。在非洲史研究中,口头传说从原先被忽视到现在被重视,以至形成一种新的传统,研究非洲历史如果不收集和使用口头传说,那是缺乏权威的。

当然,对待非洲口头传说也应持有客观的态度。非洲口头传说既包含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也存在许多为了语言匀称和华丽所使用的辞藻,为了在形式上修饰遥远的过去所编选的套话,甚至还有为尊者讳等原因而产生的非事实。有时,为夸大某个有魅力的君主的杰出业绩,低估了其他人的

① A. 哈姆帕特·巴:“逼真的传说”,J. 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一卷,第144—146页。

② T. 奥邦加:“非洲史研究中所使用的资料 and 专门技术概述”,J. 基-泽博主编:《非洲通史》第一卷,第58页。

③ Christopher Fyfe, ed., *African Studies since 1945*, Longman, 1976, p. 19.

④ Jan Bender Shetler, “Interpreting Rupture in Oral Memory: The Regional Context for Changes in Western Serengeti Age Organization, 1850—1895”, *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 Vol. 44 (2003), pp. 385—412.

⑤ Charles van Onselen, *The Seed Is Mine: The Life of Kas Maine, a South African Sharecropper, 1894—1985*, New York, 1996.

⑥ Gerald M. Oppenheimer and Ronald Bayer, *Shattered Dream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South African AIDS Epidemi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作用。口头传说列举历代国王姓名,有时带着强烈的伦理道德色彩。海尼奇发现,亡国之君不在其中,因他使民族受辱;篡权之君不在其中,因他不被承认合法。^① 所以,在利用口头传说的时候,必须熟悉当地的文化背景,了解非洲人民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和价值观念,必须对收集到的口头传说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最好收集来源不同的传说进行比较,如果可能的话应将各个敌对集团的口述史互相印证,以此提高资料准确性,如在利用曼丁哥人的口头传说时若能与班巴拉和富拉尼人的口头传说进行比较和印证,资料的可靠性就会进一步加强。

非洲口头传说属于传统文化,在非洲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样面临着新的挑战。非洲传统社会里原先靠传授口述历史而存在的专业人士即格里奥正在消失。他们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靠传述口头传说为生,被迫改行从事其他工作。与此同时,非洲国家独立后,其教育事业的发展、识字率不断提高,使得口头传说的文化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事实上,今天非洲国家的历史不再是仅仅通过口头传说来保存了。非洲传统意义上的口头传说正在消失。正因如此,非洲许多国家在独立后努力收集和整理口头传说,并用文字将其保存下来。但是,文字保持下来的口头传说就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口头传说,因为它缺乏格里奥口头版的生命气息。所以,如何抢救和保存非洲口头传说也是非洲史研究面临的非常紧迫的挑战。

(作者张忠祥,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教授;邮编:200234)

(责任编辑:景德祥)

(责任校对:王旭东)

《论历史》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黄煜文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该书讨论的主要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社会与政治两方面对于历史的运用与滥用,历史学对于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科学来说其价值何在。二是历史学家与其他研究过去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包括调查各种历史的趋势与潮流并予以批判评估。三是每个历史学家都该关心的中心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式。

^① 高崢:《非洲口头传说的史实分析刍议》。

SUMMARY OF ARTICLES

“Old Historians” and the “Five Golden Flowers” (1949 – 1966) // *Zhu Chunlong*

During the “seventeen year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ld historians” who were transformed from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good at the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hot debates about historical theoretical discussions of “five golden flowers”. They actively engaged in th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 of every “golden flower” and expressed their views, which showed some main features in using Marxist theory to undertake academic research. It also provided them with a theory stage in letting them into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Marxism.

Oral Tradition’s Position and Role in African History Studies // *Zhang Zhongxiang*

With the shifting from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to new historiography, more and more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historical studies. New theories and methods sprout out. Under this background, oral historiography has been attracting historians’ attentions. Due to the shortage of African documents and materials, especially those from Sub-Sahara Africa, the position of oral tradition in African history studies cannot be substituted. After the independence of African countries, with the efforts from the native African historical experts, the value of oral tradition is rediscovered. Oral tradition not on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xploring more materials from African history, but also can be a key medium in letting people know the deep inside from Africa itself. Contrary to developed countries’ oral history, African oral history has emphasized the following areas: politics, nations and cultures rather than sociology.

The New Historians’ Challenges to Israeli Traditional History // *Li Yemeng*

In the 1980s and 1990s, a group of Israeli historians affected by the West began questioning the Zionism by researching and investigating numero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which brought about the introspec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toward dominant ideology and induced the formation of a new trend of thought called Post-Zionism. They were called New Historians. The main views of the New Historians revise Israeli legitimacy and the official version of history, reinterpret the Zionism and query on Israel state nature and its future direction, thereby challenging official history in every aspect. New Historians have broadened the horizon of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pushed forward the academic freedom, and promoted the seculariza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 of the nation. Nevertheles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criticalness of the Post-Zionism has overwhelmed its constructiveness. Some of its proposals are too radical and unpractical, and even intensify to some extent the instability of the Israeli society.